

元朝及大夏时期重庆的区域移民特色与意义

喻学忠 唐春生

自元朝于1279年占领合川钓鱼城,至明朝于洪武五年(1372)攻灭明玉珍大夏政权,我国西南部的重庆地区经历了元朝与大夏政权的先后统治。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重庆区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潮,也在开始形成自己的移民文化特色及新的移民趋势。探讨这一时期的移民及其特色,对于认识我国西部区域性移民及我国的移民格局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一 元朝重庆移民构成的新变化

早在宋蒙(元)战争期间,由于社会控制与管理的需要,蒙古汗国便向位于西南部的重庆地区进行了移民。元政权建立后,这种移民活动也一直未曾停止过。但是与宋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移民结构却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 蒙古、色目军人及其家属成为重庆移民的重要部分。这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蒙军出征或镇戍时,有携家带口的习俗,所以蒙(元)出征重庆时即开始向这一地区进行军事移民。元朝建立后,当时众多的蒙古、色目军人家属主要聚居在蒙军占领区以作后勤基地,即蒙军奥鲁。至元九年(1272)十二月,忽必烈下诏“诸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兼管诸军奥鲁”^①;驻扎在重庆的军户,不管是蒙军奥鲁还是汉军奥鲁,其家眷自然归地方管理。这样,大批蒙古、色目军人家属就融入当地社会,长居于此而成为重庆的世居居民。其次,色目人和其他部族人组成的探马赤军曾经长期镇戍重庆地区,终元之世,这一建制始终保持着。至元十年(1273),元世祖下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②,这样成建制的探马赤军中的色目人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4页。

②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第2356页。

就地安居,成为重庆的定居编民。再次,元朝统一后,在我国西南地区也较大规模地实行了军屯,且主要分布于目前主要属于重庆行政区的重庆路、夔路等地。由于元朝蒙军、汉军的奥鲁制度,使军屯带有很强的移民性质。同时,这种军屯具有多民族性质。例如在屯田军人中,既有许多色目人,也不乏部分回回人,“凡有军屯的地方,既有蒙古族军户,也就有回族同时同地戍守”^①。

(二)驻守重庆的汉军也成为重庆移民的重要部分。当时驻守重庆的汉军主要由北方汉人组成,他们进兵重庆而屯驻于此。蒙军中的北方汉人包括归降蒙古的原金国汉人将领及其军士,以及蒙古贵族从北方各地平民中签发的军户。重庆路、夔路地处冲要,蒙古政权均设有万户府,有数以万计的军队,加上其家眷,规模应该扩大二至三倍。汉军还包括了降附蒙(元)政权的南宋军队中的非重庆户籍汉人,以及屯田军人中的部分外省籍的汉人。这些驻军本人及家属、后代多落籍于重庆,成为元代入渝移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因仕宦而移民重庆的蒙古人、色目人和非重庆户籍的汉人。在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元朝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②,可见执掌地方各级政权的官员、镇守将领及军士主要是蒙古人、色目人和归附汉人。从元朝平定重庆至明玉珍入主重庆(1279—1357),元朝实际统治重庆七十八年之久,按大多数官员任职三至五年计算,则重庆地区大小官员少则三千余人,多则五千余人。这些外地官员多带有幕僚、家属及随从人员,人口规模至少在一万五千人以上^③。达鲁花赤如较长时间在一地任职,易形成家族势力,在当地定居并成为移民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县级官员以上的俸禄菲薄,秩满离任时,家贫无积蓄,既不能谒选,又不能回归家乡,往往定居重庆当地,成为世居重庆的外籍移民。

(四)外地游民以民屯形式移民重庆,亦是重庆地区移民的重要来源。宋蒙(元)战争时期,重庆人口锐减,直至元朝统治时期,人口一直未恢复,以致重庆地广人稀。元朝前期,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四川、重庆与江南各地都有大量的北方流民。为安抚流民,恢复生产,元朝多次颁布允许流民就近纳入国家户籍的诏令。至元二十六年(1289)闰十月下诏,“籍……四川户口”^④,把这些流寓四川、重庆的人口入籍为当地民户。在元政府禁止抑良为奴政策的影响下,重庆地区也有释放被俘人口和将权贵所强占的百姓还籍为民的情况。如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一月,“籍重庆府不花家人百二十三户为民”^⑤。这些政策与举措为外地人移民重庆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所以整个元朝统治重庆期间,外地民众

① 张泽洪:《四川回族历史溯源》,《四川地方志》1990年6期。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第106页。

③ 详见李禹阶、唐春生主编《宋代巴蜀政治与社会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273—274页。

④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第319、326页。

⑤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第281页。

一直源源不断地迁入重庆,而不仅限于北方民众。元朝将迁入重庆的流民招募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民屯。元代重庆的民屯主要分布于绍庆府、夔路、重庆路等地,范围比较广泛。

正是因为元朝的政治、军事及官僚管理制度,使大量的蒙古、色目人,包括部分回回人,以及大量的北方汉人移居重庆地区,使移民构成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而大量少数民族民众定居我国西南部的重庆地区,则是在历史上少见的移民现象。

二 大夏政权时期的东人西迁

元代中后期,巴蜀地区地广人稀,大量关陇、荆襄、淮甸一带民众纷纷自发地向重庆迁居,形成了新的人口迁徙路线。在此之前,巴蜀地区移民主要来自我国北方及中原地区。元代中后期,大量荆襄、淮甸民众开始从东向西,经过湖北、湖南,而迁往巴蜀,改变了秦汉以来的移民路径,并且成为明清两代从东向西沿三峡流域进入巴蜀的移民高潮——“湖广填四川”的前奏。这种北人南徙与东人西迁的交汇,形成了元代中后期重庆区域移民南北杂混的局面。

(一) 元末明玉珍进入重庆前的移民

1. 元末大量湖广地区的普通民众移居重庆。当时以湖北为中心的江淮义军蜂起,普通民众纷纷逃难,被迫四处迁徙。而在明玉珍率兵进入重庆(1357)之前,巴蜀由于较少受到战争影响,且生齿不繁,自然成为逃难民众迁入的首选地区。所以当时迁入重庆的移民,以来自湖广地区的为最——尽管也有来自其他地区的民众。

2. 元末官宦之家避祸隐居重庆者日益增多。元末官宦之家与富豪家族,往往是红巾军打击的对象。为了避祸,他们也携家带口,纷纷移居西南一隅的重庆。这些官宦、富豪之家,人数虽较普通民众为少,却有一定规模。从散见于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些移民重庆的元朝文武官员及其眷属来自全国各地,籍贯分散,不像普通民众的占籍那么集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仍然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官宦、眷属移民重庆。特别是在北方大元政权回撤漠北后,为数众多的蒙古人、色目人因在遥远的重庆为官、定居而无法北返,只得隐姓埋名,留居重庆。为了避祸,这些人大多改名换姓且兄弟、子侄分散定居落业。据文献记载,当时元朝官宦之家落籍重庆有四种情况:其一是元末在巴蜀地区任职的外省籍官员,元亡后,原籍为农民起义军占领,无法回归故里,只好落籍重庆;其二是元末在其他地区为官的官员,见元朝大势已去,于是退隐不仕,避乱巴蜀;其三是元末随元军入川,元朝灭亡后即落户于巴蜀;其四是元朝皇族或蒙古族官宦之家,在亡国之际,为避红巾军的追杀,亡命重庆。

(二) 大夏政权时期的重庆移民

元至正十七年(1357),红巾军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沿江而上攻占重庆,开始对重

庆的实际统治。在明氏政权时期,产生了两次大规模移民活动:一是随明玉珍进入重庆的大批湖北军民;二是明玉珍建立大夏后,到湖广等地大量招募民众入川进行土地开垦及耕种,引来大量湖广民众西迁巴蜀。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被学者称之为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

1. 军队与家属追随明玉珍迁入重庆

明玉珍为湖北随州人,其义弟万胜为黄陂人,明氏起兵时的将士及追随者应以这两地区为主,是进军巴蜀的主要力量。此外,当时入川的还应有徐寿辉的旧部。因为罗田人徐寿辉曾“益兵”于归附他的明玉珍,用以镇守沔阳。随明玉珍入川的将士人数,据《明氏实录》载,至正十五年(1355)明玉珍率兵万余人至夔州府,人数并不多。但至正二十三年(1363)万胜曾领兵十一万攻云南^①,远超当初明玉珍入川时的人数;这些士兵,除吸收本地人外,还应包括从湖广地区新征募来的军士。

2. 大夏政权从湖广等地大量招募民众入川

大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实行招诱湖广百姓继续迁移至巴蜀的策略,这类移民带有官方组织的特点。饱经战乱、渴望庇护的湖广百姓也乐于前往追随本是湖北籍的明玉珍,因而形成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大批招募的湖广农户,凭借“乡人”、“乡谊”的情分,与大夏政权易产生亲近感,有利于巩固大夏政权。同时,也为地广人稀的重庆沿江各县区提供了劳动力,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税收的征收。

湖广民众迁入巴蜀的记载常见于四川、重庆的家谱、族谱。此外,还可从其他文献得到证实。根据《明史·地理志》载,元末明初四川地区曾有过撤销行政县的情况,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自西向东由多到少的局面,即撤县最多的是四川西部的成都府,其次是中部的府县,最少是川东川南地区。也就是说,今重庆地区撤县相对较少,这与该地区人口密度逐渐增高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湖广民众进入巴蜀,三峡地区是移民必经之地,其沿途地广人稀的生态环境,自然会滞留一些民众定居于此。同时,大夏政权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赋役较轻,加之地广人稀,因此吸引了大批湖广和江南地区的农户避难迁徙入川。

三 元、大夏时期重庆移民的特色及意义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重庆移民在结构上的变化,使其有着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及重要意义。

(一) 移民类型更加多样化。当时重庆区域中的政治型移民、军事型移民、生存型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元朝由于其少数民族政治、军事统治特点及生活习

^① [明] 杨可学:《明氏实录》,《学海类编》本,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291页。

惯,在占领区各地大量留守驻军及其眷属,尤其在偏远、地广人稀的区域建立起许多军屯与民屯,使大量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留居下来,成为元代的军事型移民;而许多因仕宦而最终落籍重庆的元朝官员及其眷属,以及明玉珍带进重庆地区的两湖官僚、从属及其部下、家眷,他们入籍重庆都属于政治型移民。而随着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战争的扩大,许多湖广民众自发向巴蜀移民,其迁移动因主要在于地区间空间自然格局的差异,如自然灾害、战争、人地矛盾等对人们生存影响所产生的推、拉力,因此他们在美好生活的愿景下而积极向西迁徙,这些人口应当是属于生存型移民。生存型移民虽然每次的规模不大,但其延续时间长,从元至明,总量上仍占移民的绝大多数。同时,当时重庆移民构成成分复杂。从民族成分来看,有汉族与蒙古、色目、回回人,亦有北方汉军;从职业构成来看,元朝特殊的官员铨选制度,也使许多蒙古、色目、北方汉籍的贵族、官员因仕宦或其他原因定居重庆,使这一时期的重庆移民有贵族、官员,有地主、农民,有将士及其家属。正是这些不同身份、目的的移民,使得重庆移民的民族结构多元,其移民的身份、层次、动机亦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由此使重庆区域人口结构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

(二)民众在迁徙途中其迁徙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由于重庆移民的民族性、多样性特点,它使这一地区的移民迁徙地域更加呈现出不均衡情况。在移民中,其迁移区域分布具有地域递减性规律,是一般移民迁徙中的特征。但是重庆地区的移民这一特征更加显著。由于在元代至大夏时期,移民的时间相对较长,移民的身份、阶级等次、移民原因不一,因此其地域递减性规律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重庆移民是逐步的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渐浸过程,而非迅速地平均分布于重庆全境。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他们主要是由东到西或者由北向南逐渐推进。由于不同地域的移民耕作习惯不同,他们对徙居目的地的选择也不同。北方流民进入重庆,一般选择重庆北部的较多,因为北部与西北流民原籍的地理与社会生活条件比较相似。湖广移民从长江三峡地区涌入重庆,自然首选重庆的东部区域,这里属于大江流域,与他们原籍地的地理与社会生活条件相似,也符合其耕作习惯;且当时重庆三峡地区人口匮乏,山地众多,寻求耕地的移民必然要在这里达到一定饱和度后,才慢慢向西推进,由此形成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渐浸局面。

(三)移民格局发生了大的调整,移民方向从由北而南开始转为由东向西,形成我国历史上西南部移民态势的转变。从元代初年至元末明玉珍入主巴蜀前,重庆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北人南徙。如元前、中期大规模的军屯与民屯,其人员多是由北向南迁徙,其延续时间长、人口多、数量大,这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势是相一致的。元朝重庆北部进出重庆的陆上交通,主要有两条:即广(元)重(庆)线和二广线(广元至广安)。当时的北人南迁,尤其是川陕甘一带,民众主要走汉中大巴山线路,



再通过川北经广元线或二广线源源不断进入重庆^①。在明玉珍进入重庆后,除了随其进入重庆地区的官吏、军民外,大夏政权还极力鼓励荆襄等两湖民众沿长江三峡一线进入巴蜀,这就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北人南迁的传统,开启了东人西迁即“湖广填四川”的序幕。此后,明清重庆地区的移民格局就主要以“湖广填四川”的东人西迁为主,形成中国西南部的东人西迁格局。所以,这一时期重庆地区在整个长江一带的移民格局调整上具有重大意义,有着转折性特征。

(四)以家族、宗族为主的移民方式。在元及大夏政权的移民中,重庆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以家族、宗族移民为主。当时由两湖向重庆的移民中,大都是聚族而迁。这使移民们在沿着三峡地区山高水深、艰难险阻的迁徙征途中,在家族、宗族的协力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到达目的地。同时,许多因仕宦、军屯而移民的元代文臣武将官宦军人之家,以及避祸隐居重庆的元末贵族官僚,也多以家族、家庭为单位,有全家相聚迁徙,再分散落籍各地的;亦有直接因为仕宦而留居本地仕宦的,其特征大都是有着家族性特点。正因如此,元明清以来重庆地区移民的宗族、家族情节十分浓厚,大多移民都以家族、宗族为单位而聚居。同时,这一时期重庆各县区还形成了许多省籍、县籍、乡籍会馆及宗祠,尤其是乡籍会馆及宗祠更是遍布重庆区域各县乡,形成重庆地区移民文化的重要特点,它使我们看到当时重庆地区移民们浓厚的乡情及挥之不去的宗族情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元代至大夏政权时期,重庆区域的移民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及重要意义。它既有移民属籍民族结构和阶层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巴蜀地区移民方向态势,因此形成长江流域东人西迁的移民新格局。因此,探讨重庆历史上的区域移民,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古代西部人口迁徙情况,以及我国元代以来移民的格局、特点及大趋势。

〔作者喻学忠,1970年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唐春生,1964年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4年8月28日

① 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考》,《成都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